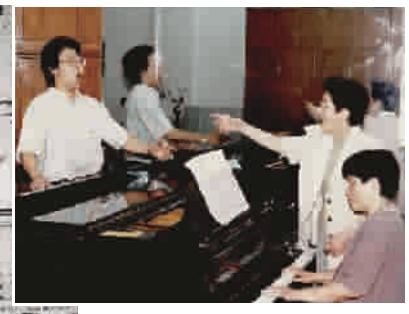
一所音乐学院的国家使命(上)

◆ 阙政

1927年11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有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府,自此,中国自己的音乐之声,如一江春潮,润民心,传世界。



▲ 周小燕指导廖昌永练习声乐
◀ 1927年11月,国立音乐院在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东段)56号成立,师生与各界代表合影

今年11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九十华诞,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办学九十年来,逐步形成了以作曲和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理论研究为核心,以音乐表演艺术学科为主体,以应用音乐为延伸的音乐艺术学科综合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音乐艺术人才,被誉为“音乐家的摇篮”。

如今,上海音乐学院再出发,秉承“和毅庄诚”的校训精神,以“双一流”为鞭策,以“办一流音乐教育、创国际先进水平”为目标,在国家民族崛起的伟大复兴之路上,奏响世界最强音。

传说诞生于新与旧、东与西、血与火的年代。那时,国家恰似承载未知命运的巨型容器,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争先恐后地在历史的舞台上竞逐独属自家的一席之地。上一秒,局势尚且激荡鸣振如恢宏的交响乐;下一秒,紧绷的旋律又泄露了波谲云诡的不可预测。

风雨如晦,前路难行。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这片土地的山河故人,总归希冀听到“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报晓初啼,点醒一份和毅庄诚的果敢、敏慧与博雅。1927年,蔡元培、萧友梅等有识之士呼吁,一定要建立一座“属于中国自己的音乐学院”。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正式成立,其办学宗旨明确“养成音乐专门人才,一方输入世界音乐,一方从事整理国乐,期趋向于大同,而培植国民美与和的神志及其艺术”。

烽火连三月,正声抵万金

在国立音乐院首任院长蔡元培、首任教务主任萧友梅的带领下,学校借鉴欧美音乐教育的体制和专业设置,结合我国实际,创立了中国近现代高等音乐教育的规格和建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创院之初的学科分类除乐理、器乐、声乐外,另设辅助——包括国文、英文、法文、体育、诗词、词曲、国音、公民、文化史、文学史等,其建校意旨之高、含义之丰,由此可见一斑。

从1927年到1937年,学校逐渐形成良好的教学传统:聘请一批高水平的中外师资;采用国际通行的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标准,推行学分制;以中外经典性的优秀音乐遗产作为主要教学材料,逐步形成了重视基础课目、坚持严格训练、勤于艺术实践和具备全面修养的学风和教风,在社会音乐教育和学术研究、创作表演方面,对当时的中国音乐建设和音乐运动作出了贡献,并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李献敏、裘复生、喻宜萱、丁善德、劳景贤、陈又新、刘雪庵、谭小麟、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冼星海、张曙、吕骥等。

烽火连三月,正声抵万金。“九一八”事变后,国立音专(1929年更名)师生创作了大量抗日救亡主题的作品,引领救亡音乐大潮的兴起。1935年,学校结束了九次搬迁租房办学的日子,第一次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办学场所——江湾校区。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进犯上海,音专江湾校舍被炸,学校迁入租界,“孤岛”时期依然坚持办学。1942年,汪伪政府改组国立音专,许多师生不甘受辱,或远赴重庆,创办国立音乐院分院;或另辟蹊径,兴办私立音乐专科学校;更有贺绿汀、向隅、吕骥、冼星海、唐荣枚、寄明、姜瑞芝、张贞黼、李焕之、李德伦、李珏等一批师生奔赴延安,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洪流。抗战胜利后,重庆“音分院”于次年归沪复校。

萧友梅在《音乐月刊》发刊词中曾提出,“在此非常时期,必须注意如何利用音乐唤醒民族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诚如萧君所望,从《国难歌》《国民革命歌》到《抗敌歌》《从军歌》,从《长城谣》《游击队歌》到《黄河大合唱》《新四军军歌》《八路军军歌》,国士独清嘉,斯音永不朽!而解放战争时期,音专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起参与了大量进步活动,成立学生自治会,先后参加上海学生“反美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等声援抗议活动;“音乐学习社”还出版了油印地下刊物《音乐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近代史的每一处转身,上音人未尝缺位,剑胆琴心,风骨凛凛。

师生并肩 群星璀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年1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前数易其名的学校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1959年,上音被文化部确定为部属六所重点艺术院校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上音与国家建设同呼吸、共命运,全体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饱满的热情和辛勤的努力,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殚思极虑,在人才培养、音乐创作、艺术实践、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影响全国乃至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十年摧折,不可摇撼音魂根本;政治冲击,岂能干扰赤子诚心;一俟神州春回,学府锦音依旧。1978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尔后,上音陆续恢复附中、附小,大学部六个系,并对专业和系科做了调整。从1980年至今,学校群星璀璨,师生并肩,在国内外摘获无数荣誉、奖项,无愧其“音乐家摇篮”之称。进入21世纪,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上音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校区筹划又上台阶,办学格局“一体两翼”,学科内涵全面构建。

敦刻尔克

[英]约书亚·莱文/著
吴奕俊 陆小夜 王凌/译

27.赫尔曼·戈林成了骗子

有很多因素使敦刻尔克海滩上的英军士兵们没法看到己方空军。一方面,英国空军最终采用了大编队巡逻,这意味着巡逻编队之间必须间隔一定距离。另一方面,德国人在敦刻尔克后方拥有观察员,他们能呼叫空袭。这使得德军飞机能在英国空军两批巡逻编队之间的“空窗期”内到达前线。第三,英国空军主要是在内陆地区飞行,支援阻击防线作战,在德军到达海滩前将他们拦下。第四,英国空军通常飞行在20000英尺或更高的空中,飞得太高地面人员看不到。第五,由于英国防空炮火会朝着任何看到的飞机开火,海滩上的英军士兵会下意识地认为看到的是德军飞机。

希尔顿·哈尔霍夫的飞行中队于6月1日下午在敦刻尔克巡逻。他注意到海滩上已经几乎看不到人了,只能看见一大堆弹坑和掩蔽用的战壕。他还能看到一排被推到海里,搭建成简易码头的卡车。在回基地的路上,他的机组成员们目睹了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和德国斯图卡轰炸机之间的混战。斯图卡轰炸机正在攻击返回英国多佛的船只。哈尔霍夫看到一架斯图卡轰炸机俯冲下去,丢下炸弹,然后再爬升。他说,“那只是一艘民用拖船,它拉着一艘载满士兵的驳船。”炸弹在拖船前面炸起一道巨大的水墙。“我觉得自己不会再看到那艘拖船了,”他回忆道,“但那艘勇敢的小拖船没受什么伤,我为它欢呼了一下。”

6月2日早晨对英国战斗机司令部来说是平静的,巡逻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战斗。飞行员托尼·巴特利记得他的中队降到了9000英尺的高度——这是违反命令的——然后他们遇到了30架德军的He-111轰炸机,他们击落了其中的18架。巴特利可以看到有德军的斯图卡轰炸机在更低高度上俯冲。这些“斯图卡”无法阻止英国远征军撤离。他们还让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成了骗子。戈林曾对希特勒保证过,说德国空军能摆平被困海滩的英国远征军,但他没能做到。

6月2日,英国空军611中队度过了第一个在敦刻尔克上空执行任务的日子。中队长约翰·麦康布还记得,飞行员们那天正准备在驻地给妻子们准备酒会。当命令发来,要求他们前往敦刻尔克时,他们决定不取消聚会,因为“不能让希特勒干扰我们的饮酒习惯”。

中队正要起飞时,一名叫做唐纳德·李特尔的飞行员匆忙跳到麦康布座机的机翼上,让麦康布晚上帮忙喂一下他的狗。麦康布夫妻和李特尔夫妻住同一间屋,同住的还有另一位飞行员拉尔夫·克朗普顿和他的妻子。

“那天早上,”麦康布回忆说,“我们遇到一大群Bf-109战斗机,陷入了一大堆麻烦,失去了两位飞行员。”“晚会开始了,飞行中队的成员三三两两地回来,每出现一个人,大家就发出一阵欢呼。而莉莉·克朗普顿和琼·李特尔(两人的妻子)则意识到,她俩的丈夫不会再回来了。她们没有流一滴眼泪,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悄悄溜出前厅,回到了小屋。”

在整个法国战役以及撤离的过程中,英国方面有931架飞机(其中有477架战斗机)在任务结束后无法返回,不是在地面上被摧毁,就是受到了无法修复的伤害。与此同时,有1526位飞行员阵亡、受伤或被俘。

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期间的统计数字相对而言更不准确。英国空军11大队上报击毁德国飞机的数量是258架。英国1953年发布的官方数据则认为有177架英国飞机被毁或被损坏,其中106架是战斗机。无论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德国空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期间的损失数量似乎比英国战斗机司令部的损失要多。双方都曾犯下错误,也都受到重创。对于英国方面来说,他们损失了许多飞机,而且他们没有完全阻止德国空军完成自己的任务。双方的机场离战场都有一定距离,这让他们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都不长。

无论德国空军最初承接的任务是否现实,但事实证明它未能摧毁英国远征军。不仅如此,它也没能大幅度地削弱英国空军。这也是德国空军第一次没能实现既定目标。

另一方面,英国空军的战绩不仅证明了德国空军并非不可战胜,而且为日后将要在本土进行的大空战积累了许多经验。最重要的是——英国空军在有利天气的帮助下,掩护英国远征军成功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

25.老年版“罗密欧与朱丽叶”

1995年的时候,黄蜀芹首次访美,在北加州一个叫牛津的小镇遇到一位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的好友高力力。闲谈中,黄蜀芹听高力力眉飞色舞地说起她的邻居——一个山东老太太,到美国来探望儿子,与一个外国老头相处时发生了许多的误会与趣事。譬如,听到美国人说“heavy”(沉重)时,她竟以为人家在说“海味”……黄蜀芹觉得特别有意思,就鼓励高力力说:“国内反映海外华人的电影大多讲留学生,来探亲的老太太的故事可能更新鲜,更能以小见大。你写出来,我来拍!”

两年后,高力力交出了《嗨,弗兰克》的电影剧本初稿。黄蜀芹没忘记承诺,2000年春,资金终于筹集到位,由上影、上海嘉禾和电影频道三方联合出品,并特邀北京一家公司来运作去美国拍摄的事宜。黄蜀芹则正式投入拍摄筹备工作,包括修改剧本,两度赴美选外景、挑演员、安排具体拍摄事宜。

从修改剧本开始,黄蜀芹就理清了思路:这部电影要突出的是,原本生活在各自一方天地里的两位老人,不远万里来到一地偶然相遇,又被拖进因两家的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冲突。语言不通,障碍重重,但他们渐渐互相理解,产生默契,直至最后互相帮助,临终关怀……

黄蜀芹通过三组人物,为大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生命状态:两位老人——“姥姥”和弗兰克,虽然语言不同,又陷入家庭利益产生的对立关系,但他们都是性情中人,布满皱纹的脸庞下有着纯洁的童心;两位中年人——戴维和妮子,他们忙忙碌碌,生活的压力使他们言行浮躁,甚至出现危机;两个孩子——晨晨和海海,都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华人,不肯讲中文,也不太愿意与父母沟通。这三种不同的生活状态,细微而多变,各有意趣。

一个美国同行看了这个剧本后说,这是老年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家庭因各自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两个老人的情感却跨越了种种障碍,直达人类关爱的极高境界。

《嗨,弗兰克》的创作人员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上海、北京、河南、洛杉矶、纽约……

黄蜀芹

写意光影织妙镜

沈一珠 夏瑜

黄蜀芹很高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合作。

黄蜀芹让自己成为一池清水,让所有创作者成为一条条活鱼,自由地游来游去。她对大家说,“我要的是一种最单纯,最职业化的合作,那就是不说客套话,可以直接切入主题做最坦诚、最平等的交流。这样,艺术创作的合作者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能量。”

2001年的劳动节到了,摄制组即将出发去美国,黄蜀芹用自己惯有的方式向所有创作人员阐明观点——写一封长信,道出拍摄某些场面的要点、在美国拍片的注意事项,以及她的思考。她向大家介绍了一本美国畅销书《相约星期二》:一位年轻人每逢星期二必去看望得不治之症的大学导师。书中指出:“临终关怀”是一种高级的人性表达。“死亡不是消亡。人死了,但你创造的爱依然存在,活在每个你触摸过、爱抚过的人的心中……”黄蜀芹认为,这就是她要拍的电影《嗨,弗兰克》的情感依据。她要让弗兰克和“姥姥”以自己的生活阅历、人生感悟向观众传达一种不同凡响的爱。她希望观众看了这部电影能感悟到这些,她的初衷就实现了。她希望所有创作人员深刻理解她的意图,在工作的时候有的放矢。

在中美两国电影人的努力下,影片《嗨,弗兰克》最终如愿摄制完成。有人说,《嗨,弗兰克》是一部中国版的《金色池塘》。黄蜀芹在作这部影片的总结时说,“中美人民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差异巨大,但人格平等、人性相通,能够超越一切障碍。”有的评论认为,这部电影生动、细腻地表现出一位山东老大娘和美国老头的情感故事,他俩虽然语言不通,但心灵却是相通的,是一对相互关爱的老人。这也是黄蜀芹对人类情感的关注:真心的关爱是所有人的渴望,发自朴素心灵的沟通可以跨越一切来自语言、文化、种族、国界的障碍。

《嗨,弗兰克》公映了,影响不如黄蜀芹之前的几部电影。有人经过分析后认为,这部电影生不逢时,是商业电影大潮的汹涌而来导致了这部艺术片的落寞。其实,黄蜀芹对这部作品也不是十分满意,“看了拍出来的电影,感觉不如以前了。我觉得自己不灵光了。”